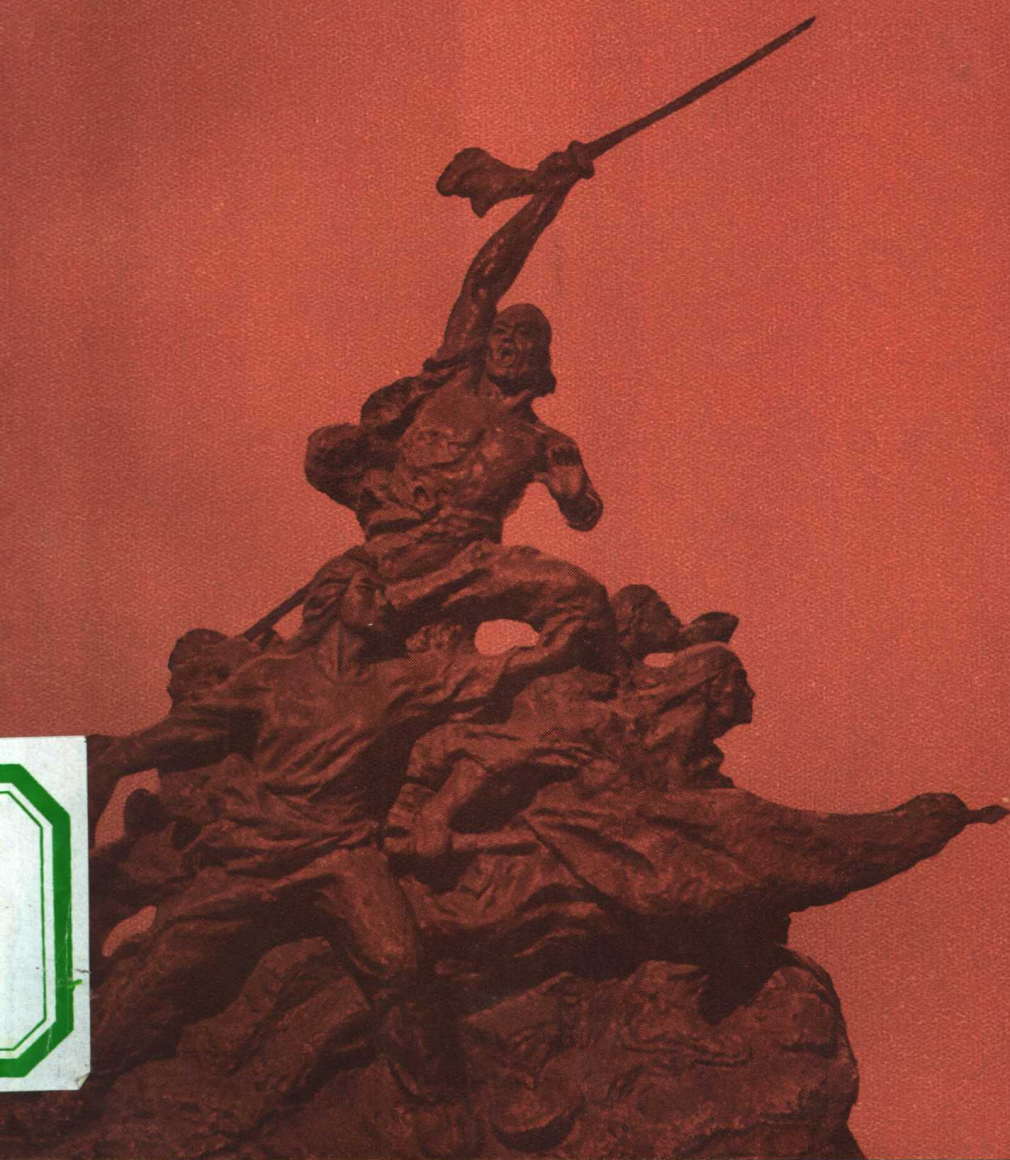


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小刀会起义

方诗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原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出版，这次重版前，作者在内容和文字上都作了些增删和修改。

上海小刀会起义

方诗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61,000

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191 定价: 0.17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目 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上海·····	1
疯狂的封建掠夺·····	7
在双重压迫掠夺下的上海棉纺织业和航运业·····	12
起义的前奏·····	17
上海小刀会的形成·····	17
一系列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	22
武装夺取政权·····	29
占领上海县城·····	29
进攻宝山、南汇、川沙和青浦·····	37
宁波、苏州人民纷起响应·····	39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1
在上海附近各县继续坚持斗争·····	45
太仓之战·····	45
嘉定、青浦、宝山、南汇、川沙之战·····	47
嘉定农民继续斗争·····	49

· 4 ·

起义军的英勇战斗.....	53
怒斥美国侵略者.....	53
在战斗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55
革命政权的政策和措施.....	62
侵略者从伪装“中立”到撕下伪装.....	69
英、美、法侵略者伪装“中立”.....	69
侵略者撕下了“中立”伪装.....	76
血战到底.....	86
革命的火焰永不熄灭.....	86
继续战斗.....	90
结束语.....	9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上海

上海,这个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河网密布,交通便利,很早以来就是全国最为活跃的商业城市之一。因此,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就阴谋策划把这个繁荣的城市置于它的魔爪控制之下,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1832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派遣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和受其雇佣的“中国通”、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乘“阿美士德”号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时,就特地在上海停泊了十八天,并作出在开拓英国殖民势力方面,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仅次于广州的结论。^①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清朝封建政府的屈膝投降宣告结束。1842年8月,清朝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可耻的《南京条约》,条约中有所谓“五口通商”的规定,上海即被列为五口之一。从此,外国侵略者

^①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版,第110页。

的魔爪就开始伸入上海，攫取到这个垂涎已久的侵略基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①

从《南京条约》签订的次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踏上上海的土地起，这个城市就被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外国侵略者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冒险家的乐园”。由于1843年清朝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继续签订的《虎门条约》中，有英国人可以在各个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的条文，巴富尔以此为借口，并曲解条文原意为占用“居留地”，与清朝地方政府进行谈判。1845年11月，清朝苏松太道宫慕久公布《上海地皮章程》，英国侵略者即霸占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的一大片土地。第二年，英国侵略者又擅自将西面界址扩充到界路。因此，这个面积约为八百三十亩的“居留地”，东到黄浦江，南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界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就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霸占到的第一个“租界”，后来叫做“英租界”。

继英国之后，法国侵略者也在上海霸占了大片土地，建立所谓“法租界”。“法租界”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城河与“英租界”南界洋泾浜之间，面积达九百八十六亩。

当英、法侵略者先后在上海霸占土地建立“租界”的时候，美国侵略者也进行了同样的勾当。从1848年开始，在美国基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91页。

督教圣公会会督文惠廉的指使下，“传教士”就纷纷在苏州河北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私自买进大量土地；这一大片称为“虹口”的辽阔地区，即全部为美国侵略者所霸占。1863年，清朝上海地方政府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承认虹口是“美租界”。“美租界”面积最大，约为七千八百五十多亩。

英、法、美侵略者在上海建立“租界”，是有它们狡诈的侵略意图的。因为三国“租界”的位置，都是在上海县城附近，紧靠着黄浦江，而英、美两国“租界”又都以苏州河为界，法、英两国“租界”更分踞在洋泾浜的南北两侧（洋泾浜是一条河浜，后来才填没成为现在的延安路），这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而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控制了这片地区，就可以全部控制上海。更重要的是，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实行了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并通过“租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间接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

英、美、法的“租界”刚刚建立起来，许多“冒险家”就象潮水一样涌向他们的“乐园”。这里有贩卖毒品的鸦片贩子，专干大规模走私勾当的商人，从事精神侵略的“传教士”，以及流氓、骗子、恶汉、绑匪和杀人犯，等等。

外国侵略者控制下的上海，成为鸦片贩子推销毒品的最大的市场。早在1848年，从上海吴淞口到广州近海，外国侵略者的三十五艘号称为“浮动堡垒”的鸦片趸船，其中十二艘即停泊在上海。到了次年，上海一地所进口的鸦片，更几乎占到外国侵略者贩运来华的全部鸦片总额的一半。^①在这巨额

毒品中,除英国侵略者占二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都是美国贩运的,甚至美国公使列威廉也不得不供认:“在中国海面最活跃的汽船,都是纽约建造的,挂的都是美国旗。”^②

鸦片贩子、走私商人的不法行为,受到英、美等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驻上海的领事,有的索性由鸦片贩子或走私商人充当。从事鸦片贩运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美商旗昌洋行,其七大股东之一的金能亨,同时就是美国驻上海的副领事;法国驻上海的领事爱棠,同时也是法商利名钟表行的职员。^③至于这些所谓外交人员如何支持他们的“商人”进行犯罪活动,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充分说明。上海有一家名叫广隆洋行的英商洋行,当它以走私规模不大,同其他洋行相形之下,自称受到“损失”两万元的时候,老板何格就上书给英国领事阿礼国:“要和任何人一样地大事走私。”英国领事也明确地答复这个老板说:“这有两路可走,——实行走私,否则,你就根本不必做生意!”这样的话,见于英国的正式历史文件,而且这个历史文件更是作为国家档案,保存在英国政府的档案库里。^④

和鸦片贩子、走私商人干着同样罪恶勾当的,是受外国侵略者派遣来上海的所谓“传教士”。

1844年,清朝政府与美国侵略者签订了《望厦条约》。伟

① 奥温:《英国对华鸦片政策》,英文版,第194—196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③ 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版,第189页。

④ 《1850年林塞致首相巴麦尊函》,见同上书,第188页。

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①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在汹涌而来的“冒险家”当中，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打着“向中国兄弟宣传福音”的旗号，事实上，在利用宗教进行精神侵略外，同时还是鸦片贩子、投机商人、间谍和凶手。

例如晏玛太这个美国南浸信会的“传教士”，他在上海设立教堂、开办学校，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散布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毒素；同时，他又充当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和副领事，“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并“在会审公堂审讯案件时，学得一套侦探的本领”。^②晏玛太更在上海从事肮脏的间谍勾当，协助外国侵略者及清朝封建势力扼杀上海小刀会起义。他把教会的房屋让给清军，“筑成坚固的炮台，室内一切窗户，均作为放弹之口。”^③这个例子充分暴露了这些“传教士”的狰狞面目。

殖民主义强盗来到上海，也如同对待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一样，残害中国人民。早在开埠后的第四天，两个无辜的中国儿童就在自己住房的篱笆后面，被一个英国强盗当

① “《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94—1395页。

② 戴勒：《教士晏玛太传》，英文版，第148、182页。

③ 同上书，第94—95页。

作靶子，开枪击伤。^①英、美、法等外国侵略者，就是这样在上海这个新开的通商口岸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人民。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②

为了侵略的需要，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所造成的买办阶级，不仅是经济侵略的帮凶，而且也是政治侵略的爪牙。当时臭名昭著的买办吴健彰，就是参与外交活动的人物。外国侵略者利用他们勾结封建势力，并且支持他们成为上海地方行政官吏。

吴健彰，广东香山人，本来是广州十三洋行中“同顺行”行商。鸦片战争后，吴健彰以捐纳在江南为候补道员，并与美国商人合伙，在上海开设美商旗昌洋行。多年来，他在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当中，结交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并深得他们的赏识。^③ 1848年，英国侵略者以“青浦事件”^④为借口，逼令两江总督李星沅将苏松太道咸龄免职，吴健彰便继任上海地方政府的最高官员。

前十三洋行行商和当时旗昌洋行股东的大买办商人出任苏松太道，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从此以后，英、美、法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控制了上海的地方政权。吴健彰在苏松太道任内的政治活动，也充分发挥了他的买办本性，成为外国侵略者的一条极其忠实的走狗，以及外国侵略者进一步勾结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桥梁。

鸦片战争以后的上海,如上面所叙述的,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所起变化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疯狂的封建掠夺

鸦片战争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迅速加重了封建剥削。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⑤因此,从十八世纪下半期以来即日趋尖锐的广大农

① 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版,第197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92页。

③ 梅朋、弗来台:《上海法租界史》,法文版,第28—29页;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版,第84页。

④ 1848年3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违反清朝关于外人所能到达之处,以往返行程不超过一日,并不得在外地过夜的规定,到青浦散发传道书,借此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因而遭到粮船水手的殴击。在美、法等国领事的支持下,英国领事阿礼国硬说距离上海几十华里的青浦,是在“官定范围”之内,强迫中国政府“惩凶”。这个领事又以停付关税、封锁一千四百艘即将北上的粮船,并派副领事罗伯逊乘坐兵船到南京,对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加压力。清朝政府最后在英国侵略者的恫吓下屈膝投降,枷责了水手十人,其中两名并分别被判处徒刑和流刑,此外,还允许英国侵略者将“租界”扩充至二千八百二十亩,较原有面积增加了两倍多。上述事件一般称之为“青浦事件”。

⑤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1页。

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以及清朝政府封建剥削的加强,而迅速高涨。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旗帜,逐渐形成为如火如荼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在农民起义大风暴席卷全国的革命年代里,上海地区是风暴的中心之一。

明、清两代,江苏省的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州,是全国田赋,即一般所称钱粮,负担最为沉重的地区,甚至封建统治阶级也承认这里的田赋大大超过了一般限度,因而称之为“浮粮”或“浮赋”。在鸦片战争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苏、松、太地区的浮赋更迅速增长,与过去相比,比元朝多了三倍;与同属江苏省的其他地区如镇江府相比,多了四、五倍;与其他各省相比,更多到一、二十倍。^①此外,清朝官府还有许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额外勒索。以苏州府所征收的漕粮为例:根据规定,漕粮本可以用“本色”(米)或“折色”(银)两种不同的办法交纳。但是交纳的时候,如是“本色”,则官府可以任意强迫多交或以折扣计算,称为“浮收”;“浮收”所打的折扣,每石米从五斗四升起,约至六斗止。至于其他名目繁多的额外勒索,还有所谓“淋尖”,斛内的米已经堆得尖尖的,再淋上一大把;“踢斛”,量米时多次用足踢斛,使减少空隙,增加容量;“样盘米”,任意在额外收米,表面上作为样品;“贴米”,对米的成色任意加以挑剔,如不贿赂,必补贴米若干。此外,还有许多所谓“私费”,仅“水足费”(运输费)一项,定例是五十二文钱,到1853

^① 光绪《青浦县志》卷七。

年即增加至三、四倍。额外“浮收”，再加上其他花样百出的各种勒索，必须交纳二石五、六斗米才能完正额钱粮一石，即是说，官府实际征收的钱粮数量超过了规定的一倍以上。^①如是交纳“折色”，则必须按照官府所规定的米价，勒令交纳超过市价数倍的银两，称为“勒折”，其压榨的程度与“浮收”完全一样。

属于松江府和太仓州的上海及其附近各县，更存在特殊的情况。首先，上海和附近某些县分，其钱粮负担，较苏、松、太地区的其他各县尤为繁重。就上海、南汇两县而论，当鸦片战争时，上海官府以“勒折”方式所强加的额外负担，即已从过去每一石米五千文的折价，提高到七千九百九十文，而当时一石米的市场价格不过是三千文。^②战后的南汇县，“浮收”必须交纳三石米方能完正额一石；“勒折”，则一石米的折价更达八千九百九十文。^③因此，乔重禧《夷难日记》中曾经说：“苏、松漕赋之重无过上海。”^④黄报廷《南沙杂识》也说：“南邑漕价通郡为冠。”可以看出，上海一县的钱粮负担与苏州、松江两府的其他县分比较起来，是最为沉重的，南汇一县也是松江府所属各县中钱粮负担占据首位的县分。其次，上海和附近某些县分，以地处海滨，土壤中含有大量碱质，因而以种植抗碱能力最强的棉花为主，稻米在农业生产上所占的比例，远较棉花为

①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

②④ 乔重禧：《夷难日记》，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16页。

③ 倪绳中：《南汇竹枝词》。

小。以当时上海、南汇、镇洋(今太仓)、嘉定、宝山等县为例：上海、南汇两县棉花和稻米的生产为七与三之比，即种植棉花的土地占十分之七，而稻米则仅占十分之三；^①至于镇洋、嘉定、宝山三县，也同样如此，即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棉花居其七、八。^②因此，对于这里特别沉重的钱粮负担，一般是用棉花织布，把布卖出去换来银子，再用银子买米交纳，形成“取他邑之粟，充本县之粮”的畸形状态。

这种沉重的钱粮负担，通过地租转嫁到佃农身上，因而造成地租的不断加重。在苏、松、太地区，佃农租种地主土地，每年秋天的收获，一亩土地最多不超过三石，少的只有一石多，但是地主的租额却高达一石五斗。此外，官府收取钱粮，有所谓“浮收”、“勒折”，同样，地主收取租米，也有所谓“租斛”、“折价”。按照规定，地租本来是交纳实物的，但是地主却不收米，强迫农民折合成钱交纳，其价格由地主任意决定，远超过当时的一般市价，称为“折价”，农民一般需以一石二、三斗，甚至一石四、五斗，才能完纳一石米的租额。即使地主允许交纳粮食，又有所谓“租斛”的额外苛索，农民也需以一石二、三斗米才能完纳租额一石。当收租时，如狼似虎的地主狗腿子和差役更横行无忌，可以任意把农民捆绑起来，关进监牢。此外，清朝官府还允许豪绅地主私设公堂，对农民施加各种非刑，或者通过官府，严刑拷打农民，使用所谓“一板见血”等残酷刑法。在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掠夺下，广大农民被迫卖尽了农

① 《上海县续志》卷五；光绪《南汇县志》卷二〇。

② 林则徐：《太仓等州县卫帮被欺收请缓新赋折》，见《林文忠公政书》卷二。

服、农具和耕牛，甚至他们的子女！^①

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所引起的银贵钱贱的现象，特别是松江、太仓地区在外国“洋布”倾销下所形成的严重后果，使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农民，在迅速加剧的封建剥削之外，又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沉重打击。银贵钱贱是这时的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由于鸦片战争赔款、“洋货”倾销和鸦片走私，外国侵略者在短期内从中国掠走了巨额白银，以致银价高涨，铜钱下跌，银与钱在兑换率上的距离愈来愈大。以江苏省为例：战前一两银子值钱一千文或一千二、三百文，到1846年，就上涨到一千八、九百文。但民间卖米均以铜钱计算，而政府所收取的钱粮则为白银，至于米价，战前战后的一般价格都是三千文，基本上没有变动。因此，战前一石米值三千文，一般可以换到三两银子，这时，一石米同样值三千文，却一般仅能换到一两五钱银子，在一进一出之中就吃亏了一半。至于上海和附近某些县分长期以来成为广大农民生计主要来源的土布生产，在外国“洋布”倾销下所遭受到的打击，则是更为沉重和巨大的。

综上所述，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由于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急遽加重的钱粮负担，地主阶级日趋疯狂的封建掠夺，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引起的银贵钱贱、土布衰落等等，使广大农民迅速陷于破产失业、饥饿死亡的境地，阶级矛盾也从而迅速趋于激化。在全国性革命大风暴的推动下，上海及其附近各县，先后爆发了以抗粮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青浦抗粮

^① 陶煦：《租粮》。